

《诗经》英译中声音景观的文化生态重构机制研究

周照兴, 刘亚情, 李文珍*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 要 : 翻译学界长期聚焦《诗经》英译的语义传达与形式对应, 却忽视其作为“声音的典籍”的感官本质。本文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视角, 将《诗经》声音景观视为自然、社会与情感维度交织的文化生态系统, 通过分析其原生声景的韵律结构、音响修辞与仪式性特征, 梳理英译过程中语音模拟、韵律代偿、结构变异三类核心重构机制, 揭示译者在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语诗学规范间的协商逻辑。研究发现, 声音景观的跨文化重构本质是文化生态的适应性调适, 需在“解构-转换-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实现“音-义-境”的协同传递。本研究突破翻译研究的视觉中心主义局限, 为中华典籍外译的感官维度传递提供学理参考。

关 键 词 : 《诗经》英译; 声音景观; 文化生态; 重构机制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Soundscap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Zhou Zhaoxing, Liu Yaqing, Li Wenzh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545006

Abstract : A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long focused on the semantic transmission and formal 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while neglecting its sensory essence as a "classic of sound". Adopt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is study views the soundscape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s a cultural ecosystem interwoven with natural, soc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s. By analyzing the rhythmic structure, acoustic rhetoric, and ritu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riginal soundscape,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cor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phonetic simulation, rhythmic compensation, and structural variation. It further reveals the negotiation logic employed by translators between source culture traits and target language poetic norms. It's found that the cross-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soundscapes is essentially an adaptive adjustment of cultural ecology, which requires the synergistic transmission of "sound, meaning, and context" through a dynamic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 transformation -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breaks through the visual-centric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sensory dimens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 of Poetry; soundscape; cultural ecology;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引言

(一) 研究缘起

翻译学界围绕《诗经》英译的意译与形译争论, 长期局限于语义与形式的二元对立, 却忽略其诗乐舞一体的原生属性^[1]。《诗经》305篇皆为配乐歌谣, “关关雉鸣”的鸟鸣模拟、“坎坎伐檀”的劳作节奏、“钟鼓喤喤”的仪式声效^[2], 构成周代农耕社会的文化记忆与生态智慧。现有相关研究的理论短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微观翻译层面来看, 学界未建立声韵翻译效果的评估框架, 针对《诗经》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等音律特征^[3], 其跨语言迁移处于经验性讨论阶段; 从宏观文化传播层面来看, 现有研究普遍弱化了声音景观承载的文化生态载体功能, 将翻译简化为文字符号转换。如理雅各 (James Legge) 的散文体译本与韦利 (Arthur Waley) 的节奏体译本对同一拟声词“关关”分别处理为“kwan-kwan”的原声摹拟与“fair, fair”的转译。这种差异化处理折射出译者对源语声景文化功能的认知分歧。

选择《诗经》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三重考量: 其一, 其文本生成于口头传统, 其蕴含的声音要素具备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元代码”性质; 其二, 《诗经》历经三千年阐释传统所积累下的声训、音韵文献, 为还原原生声景提供训诂依据; 其三, 目前学界留存的二十

项目 / 基金信息: 本文系2023年度广西哲社外语专项项目 (编号: 23WYL002)、2025年广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编号: GKYC202508) 和2021年度广西科技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编号: 2021YKCSZ09)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照兴系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教育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亚情、李文珍系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余种全译本构成历时性比较的理想样本。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突破翻译研究的视觉中心主义范式，将听觉维度纳入文化传播的生态考察。

（二）研究问题与核心概念界定

声音景观（soundscape）的概念由加拿大音乐家谢弗（R. Murray Schafer）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其理论根源在于对工业文明下噪声污染的批判性反思，旨在借助声学生态学（acoustic ecology）重构人类与声音环境的和谐关系^[4]。作为周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听觉载体，《诗经》中的声音景观并非孤立的音响集合，而是自然之声、社会活动与情感表达深度交融的复合生态系统^[5]。

基于这一特性，本研究对两个核心概念予以清晰界定。其中，声音景观指诗歌文本中可感知的听觉维度系统，既包含韵律模式、声学修辞、结构复沓等显性特征，也涵盖潜藏的场景区效与文化共鸣；文化生态则强调声音与社会语境的动态关联，特指《诗经》声音中所承载的农耕文明信息、礼乐制度意涵以及集体情感记忆。

在《诗经》英译领域，学者多聚焦于意象传递或思想阐释，如余宝琳等对比兴手法的分析^[6]，却鲜有针对声韵系统的专门性研究；同时，翻译学科内的声音研究，也多集中于现当代诗歌的韵律转换问题，尚未形成适用于古典文本声景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此外，生态翻译学虽强调整体适应原则，却未发展出分析感官要素的具体方法。这使得《诗经》英译中“声—义—境”的协同迁移，成为典籍英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三个递进式核心问题：跨语言转换过程中，《诗经》原生声音景观经历了何种形态变迁？译者采取哪些具体策略，实现声音景观的文化生态重构？不同重构机制在诗学表达效果与文化内涵传递方面，分别存在哪些优势与局限？

一、《诗经》声音景观的文化生态结构解析

（一）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声音景观本质

文化生态学以系统论和生态观为指导，强调文化客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7]。依托这一理论发现，《诗经》的声音景观并非孤立的修辞修饰，而是与周代农耕文明、礼乐制度深度联结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一声景系统遵循适应与调适的生态法则：自然之声为社会活动赋予时间坐标，社会声景为大众情感表达划定文化边界，情感声景则为自然之声赋予人文意涵。三者形成“声—意—境”三位一体的共生生态关联。

从文化生态的适应性特征来看，《诗经》声音景观的生成，是先民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秩序的文化实践结果。鸟兽啼鸣、风雨之声等自然声响，经由先民观物取象、比兴赋情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承载主观情志的审美符号；伐木的号角声、祭祀的乐音等社会声响，则以节律模式维系群体协作与制度规范；四言句式、双声叠韵等语言声响，进一步将抽象的情绪体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形态。这一三维一体的结构，让《诗经》的声音景观成为礼乐文化的全息投影。

（二）《诗经》原生声音景观的三重维度

从《诗经》的仪式乐歌传统来看，其声音景观在自然、社会、情感三个维度实现了有机交融。这一经典结构既承载着周代先民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也深度镌刻着礼乐文明的文化基因。

从自然维度而言，环境声响是情感的编码载体。自然之声是《诗经》声音景观的基底维度，文中的鸟兽啼鸣、风雨之声等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记录，更是情感表达的音响媒介。《关雎》中摹写“关关雎鸠”的鸟鸣，以双音节叠字强化声音的连贯感，既还原水鸟和鸣的自然情态，又巧妙隐喻婚恋主题的欢快意境；《伐檀》中“坎坎”的伐木声，借反复铿锵的声律传递出先民勤勉劳作的质朴品行，蕴含着对劳动伦理的肯定。这种自然之声的审美转化，折射出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社会维度的声响集中体现为两种文化实践：一是集体劳动的节律性声响。如《七月》中“凿冰冲冲”的劳动号子，以声音的反复构筑起群体协作的听觉联结；二是祭祀宴饮的仪式化声响。

如《鹿鸣》中的“鼓乐之声”，构成了礼乐制度的声音标识。这类社会声景具有明确的规训功能，其声波的律动模式与群体行为规范形成同构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文化载体。

情感维度的声音景观，通过语言本身的音乐性编码得以实现。四言体式的“二二”节律，营造出庄重典雅的仪式感；双声叠韵的叠字辞汇，以“参差”“窈窕”这类声母、韵母的反复，创造出听觉的审美愉悦；重章叠句的章法结构则通过声景结构的循环往复，强化情感的张力。以《蒹葭》为例，全诗三章仅微调字句，反复咏叹迷惘的心境，形成声情交融的审美效果。这样的声景设计，让情感表达契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并借助声音的物质性，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

自然之声为社会活动赋予时间坐标，“五月鸣蜩”即是以虫鸣锚定节令的典型例证。社会之声为情感表达划定文化边界，宴饮场合中的奏乐虽容纳欢愉，却始终在礼制的框架之内。情感之声又为自然之声赋予人文意涵，雉鸣啼鸣由此超越物候层面，成为婚恋伦理的隐喻载体。这种相生相济的共生关系，让《诗经》的声音景观成为礼乐文化的全息投影，而跨语言翻译行为的介入，会打破这一生态平衡，进而推动古典声景生态的重构与流变。

二、《诗经》英译声音景观重构的生态失衡反思

（一）英译声音景观的现实生态困境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依赖各要素的比例协调，《诗经》英译过程中声景重构的失衡，本质是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语诗学规范的冲突。英语诗歌的重音计时与汉语的音节计时存在本质差异，致使《诗经》四言句式节奏的均匀绵延感难以直接移植；英语诗学对“重复”^[8]的审美普遍持审慎态度，使得重章叠句的仪式性功能在翻译中被弱化；加之中英音响审美的价值序列差异，造成双声叠韵等修辞的文化内涵流失。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语境变迁，进一步加剧了《诗经》英译声景的生态失衡。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习惯，使得英语读者对《诗经》中冗长的重复结构接受度大幅降低；与此同时，跨

文化传播过程中往往存在的功利性导向，也导致部分译者在翻译时陷入重可读性、轻声学性的误区，为了让英语读者更易理解，译者往往会不惜牺牲原诗的声学特质与艺术本色。上述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最终导致《诗经》英译声音景观呈现出语义留存而声音流失^[9]的普遍现象。

（二）声景重构失衡的动因剖析

英译声景重构失衡的根源贯穿语音、韵律、结构三大层面，且各层面动因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失衡现象的逻辑链条。

语音层面的核心动因是文化编码的可译性限度。汉语拟声词高度依附本土语境，且音与义之间的关联根植于华夏文化土壤。

《鹿鸣》中“呦呦”不仅模拟鹿鸣，更暗含“食野之苹”的宴饮礼仪，这种文化编码在英语中难以完整复刻。理雅各的音译策略虽保留音位特征，却容易导致英语读者的理解障碍；韦利的意译策略虽实现功能等效，却消解了原诗的声学质感。语音模拟的困境，本质是源语声音文化元代码的不可译性。

韵律层面的核心动因，是诗学传统的结构性冲突。英语诗歌长期以抑扬格五音步为传统主流范式，注重韵律的规整性与节奏感，而《诗经》则以四言节奏为核心，依托平仄变化、押韵规律营造独特韵律美，二者在韵律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理雅各的散文体翻译通过句法平行补偿音乐性损失，却牺牲了原诗的韵律密度；许渊冲的韵体翻译以英语格律置换汉语平仄，却改变了原诗的节奏范式。韵律代偿的内在矛盾，反映了中英诗学传统对音乐性的不同定义。

结构层面的核心动因，是审美观念的文化差异。诗歌结构作为艺术表达的重要载体，其设计逻辑与审美取向往往与所属文化的审美观念紧密相关，而中英诗歌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诗经》结构艺术在英译中的形变。汉语诗歌传统中，重章叠句并非简单的结构重复，而是一种极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其通过句式与韵律的重复，实现情感的逐步强化、意境的层层深化与仪式感的营造；与之相反，英语诗歌传统更加强调语义的推进、意象的创新与逻辑的连贯，对重复结构多持审慎甚至排斥态度，认为其会导致表达冗余。

三、《诗经》英译声音景观的文化生态重构路径

文化生态系统具备自我调适的内在机制，声景重构的平衡需由内生态系统主导，以通过合理配置语音、韵律、结构要素，实现与目标语外生态系统的有效互动。

（一）语音模拟：异化策略与文化补偿

语音模拟的核心是在保留源语声学特质的同时，降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门槛。针对具有文化标识性的拟声词，可采用音译+注释的异化策略，如将“关关”译为“Guan-guan”并加注“the mating call of water birds”，既保留声音质感，又传递文化内涵。针对普通拟声词，则可采用功能等效的归化策略，如将“坎坎”译为“thump-thump”，以英语读者熟悉的拟声词传递劳作节奏。语音重构的关键在于区分核心声景与辅助声景，对承载文化记忆的核心声景优先采用异化策略，对起修饰作用的辅助声景适度归化处理。

（二）韵律代偿：格律转换与节奏等效

韵律代偿的本质是寻找中英诗学传统的感知重叠区，实现节

奏功能的等效传递。对于四言句式，可采用英语民谣体的四音步结构，以重音节奏对应汉语的音节节奏，如19世纪理雅各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译为“Graceful and young the peach-tree stands; How rich its flowers, all gleaming bright”，既保留原诗的欢快韵律，又符合英语诗歌的审美习惯。对于双声叠韵词，可采用头韵、谐元韵等英语修辞进行补偿，如将“参差荇菜”译为“the trailing water plants”，通过“trailing”的辅音重复模拟“参差”婉转起伏的听觉效果。韵律重构的关键在于“以韵补声”，而非机械移植源语固有的韵律形式。

（三）结构调适：变奏保留与文化适应

结构调适的核心是平衡重章叠句的仪式功能与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对于仪式性强的诗篇，可采用“变奏式保留”策略，如许渊冲翻译《蒹葭》“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时，保持三章的平行结构，同时通过“green, green the reed”“white, white the reed”“bright, bright the reed”的色彩渐变替代原诗的词汇变化，既延续仪式感，又增强英语读者的感官体验。对于抒情性强的诗篇，可适度简化重复句式与结构，通过语义递进强化情感表达。结构重构的关键在于把握“重复”承载的文化功能，而非拘泥于形式上的对应。

四、结语

本研究将《诗经》声音景观视为文化生态系统，系统分析其原生结构与英译重构机制。研究发现，《诗经》声音景观的跨文化重构并非简单的音形转换，其本质是译者在源语文化生态与目标语诗学生态之间的适应性调适，前者植根于农耕文明、礼乐制度与集体记忆，后者则受制于重音计时传统、审美取向与接受习惯。在国际传播中翻译工作需致力于实现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有效对话^[10]。中华典籍声音景观的翻译则应遵循解构、转换、重构的动态生态规律，在文化保真与语言适配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以达到传音、达意、造境的三重目标，从而破解《诗经》英译中语义留存而声音流失的普遍困境。

参考文献

- [1] 傅修延. 听觉叙事初探[J]. 江西社会科学, 2013, 33(02): 220-231.
- [2] 黄志强, 杨剑桥. 论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原因[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 (01): 98-101.
- [3] 陈莹莹. 聚焦重章叠句品味丰富诗意——《关雎》教学设计[J]. 中学语文教学, 2025, (4): 57-61.
- [4] Schafer R M. Soundscape studies: the early days and the future[J]. Acoustic Ecology Review, 2013, 12(1): 6-9.
- [5] 李荀华. 论“和”对《诗经》音律理想化的影响[J]. 中国文学研究, 2006, (04): 61-64.
- [6] 余宝琳, 耿百鸣, 乐俊华. 抒情诗的比较研究——读《诗经》札记[J]. 文艺理论研究, 1984, (02): 85-89.
- [7]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 [8] 彭宇超. 生命之歌：《诗经》中的重复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23.
- [9] 李玉良, 王冲. 《诗经》韵律翻译策略探索——以詹宁斯、许渊冲译本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0(4): 53-67.
- [10] 李宇. 国际传播话语叙事效力与翻译策略：适配、对话与转化[J]. 现代视听, 2025, (06): 85-88.